

这是一本富于学术价值的

美学专著，也可以说是学习美学理论及中国美学史的必修读物。本书内容可分三部分：一、作者生平事迹；二、代表作品；三、美学主要观点。涉及中国历代有代表性的美学家 60 余人，从先秦至当代，纵贯两千余年的中国美学发展历程。

本书在写法上具有介绍与评述结合，简传重评的特点。做到了介绍翔实，评述简赅，观点

中 国 美 学 家 评 传

姜小东 姜万宝 韩沛林／主编



鲜明。读者可从《中国美学家评传》中，窥得中国美学史的真实的发展全貌，是一本难得的理论读物。

B.B3-06

14

中国美学家评传

姜小东 姜万宝 韩沛林

主编

吉林教育出版社

(吉) 新登字02号

中国美学家评传

姜小东 姜万宝 韩沛林 主编

责任编辑：刘丛星 王晓枫

封面设计：曲 刚

出版：吉林教育出版社 850×1168毫米32开本 18印张 6插页 433 000字

发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000册 定价：12.00元

印刷：长春新华印刷厂 ISBN 7-5383-1907-7/K·66

前　　言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极为丰富的优秀思想文化传统的民族。它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伟大的思想宝库。弘扬我们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是每个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的优秀美学思想，这对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美学体系，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都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从中华民族丰富的美学思想遗产中，可以看出我们民族美学思想的丰富性和独创性。仅就古典美学范畴中的概念、范畴和规律，有许多是为我们民族所独有。有些美学思想历史悠久。如孔子的“尽善尽美—美与善的高度和谐”的思想，再如我国古典美学中的“情和理”、“形和神”、“虚和实”、“言和意”、“意境”等美学范畴，是西方所没有的。再就我国美学的发展历程来说，也是独具特色的。下面，我们就按中国历史发展的顺序，粗略的介绍如下：

(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国美学思想由启蒙到初步繁荣时期。西周末年出现的“和谐为美”的思想，写下了中国美学思想的第一页。到东汉末，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初步繁荣。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孔丘、墨翟、老子、荀况、韩非、王充等。在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的论战中，对美的认识有了飞速的发展。春秋以前出现的中和审美观念，到了战国时期便系统化了。并出现儒道两家对自然美认识的两种不同观点。中和思想和非中和思想展开

了激烈的交锋。这种互相斗争，互相补充深刻影响以后美学思想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美学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与发展。佛学的传播和佛教艺术的发展，对这个时期美学思想有一定影响。这个时期的美学思想一是重视个人情感的抒发；二是促进了审美崇尚从雕琢绮丽转向自然清新；三是“无声哀乐论”的形成；四是中和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嵇康、陆机、葛洪、顾凯之、刘勰、钟嵘等。

到了唐宋时期，文学空前繁荣，不同风格流派百花齐放。审美认识向前发展了一步。关于艺术境界、风格的审美特征，形成了系统的认识。这个时期的美学思想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心物关系认识上的不断变化和反复论争。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孙过庭、韩愈、张彦远、司空图、郭熙、苏轼、朱熹、严羽等。这些人的思想和成就，对后来的书法艺术、绘画、文学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他们的成就是审美认识发展的必然结果。

到了元、明、清时期，随着政治经济的变化和小说、戏剧的繁荣，美学思想也有了突出发展，在审美倾向上崇尚“自然之为美”，反对封建传统束缚情感，反对“中和之为美”，提倡独创，强调变革。清朝初年又出现了一些唯物主义美学家，他们把封建时期的美学思想推到顶峰。这个时期的突出代表王夫之，他的美学思想十分丰富，认识深刻。刘熙载又是一个代表，他的《艺概》的出现和成就，是我国封建时期传统美学思想终结的标志。自此以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美学思想便蓬勃兴起。

随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和改良运动的兴起，近代美学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以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引进了西方资产阶级美学思想，主要的是介绍康德、尼采和叔本华的著作。梁启超鼓吹宗教和唯心主义。他在《唯心》中主张“惟心所造之

境为真实”、“心外之境无真”的结论。对审美情趣的看法，他则认为是人类生活要素之“最要者”，离开了美，甚至人活不成。而王国维认为美和美感均是超功利的，艺术不应为政治理论服务。蔡元培是我国近代美学思想史上的最后一位名家，又是我国现代美学思想的先驱者之一。他介绍了不少西方现代美学思想。他强调美育教育，并称美育教育为世界观教育。这些思想在抵制和清除尊孔忠君以及崇洋媚外的思想上有着积极意义。

中国现代美学的研究，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一门科学的美学并未得到很大发展。虽然，蔡元培提出美育教育，鲁迅写了《摩罗诗力说》等美学文章，但国内从事美学研究的人寥寥无几。宗白华是我国从事美学研究比较早的学者，并在大学讲授西方美学。朱光潜的美学著作在现代中国影响较大。到了二、三十年代鲁迅和瞿秋白开始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四十年代，周扬翻译出版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这本译著不仅在当时，而且一直到解放后影响也颇为广泛。蔡仪的《新美学》是一部系统的美学专著，这本书与周扬翻译的《生活与美学》是当时两本有影响的重要著作。

中国当代美学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美学思想的指导下，逐步走向繁荣。当代美学发展的历程大体可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49年至1956年。《文艺报》曾刊载朱光潜和蔡仪互相讨论的文章。1953年又发表了吕荧的文章批评《新美学》，然而，这些文章都未引起争论。第二个时期是1956年至1965年。从《文艺报》上发表朱光潜的《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开始，展开了大讨论。《人民日报》发表了蔡仪的（《评〈论食利者〉的美学》）的文章，他一方面批评了朱光潜，一方面重申了他本人的美学观点。接着《人民日报》发表了李泽厚的《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

一文，他批评了朱光潜，也批评了蔡仪，形成了三派对立的美学理论，引起了全国学术界和文艺界的极大兴趣。《新建设》、《学术月刊》纷纷发表文章，就美学本质、自然美，美学对象等美学基本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第三个时期从1978年至今。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美学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各种学派、各种学术观点，百花齐放。关于美的本质，关于自然美、关于美的对象等问题开展了学术争鸣。代表性人物有：朱光潜、蔡仪、王朝文、蒋孔阳、李泽厚、高尔太等著名美学家。其中蔡仪认为美就是“美的规律”，蒋孔阳、高尔太认为美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以上两种观点颇有影响。

我们这本《中国美学家评传》就是按着上述的中国美学发展的框架，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国历代美学家，分别加以评说。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力求简传重评，突出美学思想的介绍。对国内有定论的观点，我们基本上予以采纳，对有些观点，我们稍加补充或说明。这里我们向被汲取其部分研究成果的专著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写一本从古至今的《中国美学家评传》是一项尝试性的工作，尽管我们努力工作，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难免有不当之处，尚祈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不吝赐教，以便修正。

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受业师长——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古汉语专家、书法家孙常叙先生。他年过八旬，身患疾病，还为《中国美学家评传》挥毫题写书名，实在令我们感动不已。

编 者

1992年9月

主编 姜小东 姜万宝 韩沛林

副主编 颜振华 王树信 杨耀辉

鲁志仁 鮑海涛

编写人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秀兰 王丽华 王英华

王铁军 王朝国 孙功发

刘志军 刘丹辉 吕玉明

任丽霄 朱洪贵 杨耀辉

李丽萍 李敏明 阎德丰

张玉秀 学君 赵光

范玮 侯英奇 姜万宝

郝耘 郭荆运 韩沛林

盖生 费念椿 鲁志仁

统稿人 姜万宝 韩沛林 杨耀辉 鲁志仁

目 录

前 言	1
孔 子	1
墨 翟	10
孟 子	19
老 子	27
庄 周	36
荀 况	45
韩 非	54
董仲舒	64
司马迁	72
扬 雄	80
班 固	87
王 充	94
桓 谭	102
曹 禤	110
阮 籍	117
嵇 康	125
陆 机	133
沈 约	140
葛 洪	146
顾 恽之	154

刘 鶴	161
钟 燥	170
郭 熙	178
孙过庭	188
皎 然	194
张 璞	203
韩 愈	212
白居易	218
张彦远	227
司空图	232
苏 轼	239
朱 熹	248
姜 夔	254
严 羽	259
李 贽	266
汤显祖	276
袁宏道	287
王夫之	292
叶 变	301
郑 变	310
李 渔	315
金圣叹	323
袁 攝	330
王士祯	344
翁方纲	353
姚鼐	361
龚自珍	369

黄遵宪	377
刘熙载	385
梁启超	394
王国维	404
鲁 迅	413
蔡元培	435
朱光潜	449
宗白华	463
周 扬	479
蔡 仪	494
王朝闻	509
蒋孔阳	523
李泽厚	536
高爾太	556

孔 子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又是中国美学理论最为重要的奠基者。

孔子生活的时期正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转化的春秋时代。孔子先世为商代后裔宋国的贵族，本为子姓，孔是其氏，因遭家难，被迫离开宋国，迁往鲁国定居。父叔梁纥，做过鲁国陬邑的大夫。孔子3岁时他父亲去世，孤儿寡母，生活极其艰苦，家庭早已由贵族下降为一般平民，曾做过小司仪者、粮仓保管员和管理牛羊畜牧一类小官。孔子少年时受过很好的教育，知洒扫应对之节、五礼六乐、五射五御、六书九教之文，勤奋好学，曾问礼于老聃。中年后，开始授徒讲学，五十多岁时由中都宰擢任司寇，参与国政。曾当过三个月的代理国相，终因政见不合，便率领弟子离开鲁国，先后周游卫、曹、宋、郑、陈、蔡、楚等国，奔波14年，到处碰壁，七十多岁又回到鲁国，继续从事文化教育活动。孔门弟子达三千人，“受业身通者”72人。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辑录他的言论编成《论语》一书，其中保存孔子的生平、学说等重要史料，它的内容广泛丰富，涉及哲学、美学、政治、教育、文艺等许多方面，是研究孔子思想的最重要和最可靠的文献。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仁”是他的最高的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孔子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所谓“中庸之道”，他提出

“和为贵”的“不偏不倚”的主张。在世界观上，孔子认为人受天命制约。“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但对鬼神又“敬而远之”，抱存疑态度，强调人重于鬼，生贵于死。

孔子首创私人办学，公开提出“有教无类”的口号，打破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具有划时代意义。他明确地主张行在文先，教学相长，诱导启发，因材施教，重视发挥受教育者的主动精神。在学习态度上提倡“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耻下问”。孔子的这些符合教育教学规律的经验，已成为我国教育史上的宝贵财富。

作为一位古典美学思想的奠基者，孔子的美学思想是相当丰富的，有待人们去挖掘整理。

孔丘以“礼”为核心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礼”指周王朝的一整套政治制度、道德规范和各种礼节仪式。孔子认为周礼是社会最高准则，为此以恢复周礼为己任。他认为采用引发氏族血缘关系的亲子之爱的相亲相爱的心理情感因素，使之成为人性的内在欲求，才能建立“周礼”所规范的社会秩序，天下才能太平。孔丘正是从人的普遍心理因素出发，采取以“仁”释“礼”的办法，说明“礼”是植根于人的本性的，是每个人能够实行的行为，由此产生了孔子的仁学。他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在孔子看来这种以氏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子之爱，就是“仁”的根本，只要唤起这种人所共有的亲子之爱，并使它成为人们发自内心的自觉行动，那就极少有“犯上”作乱的坏事发生，社会就可和谐发展，“礼”自然就可以得到恢复。假如把这种“仁者爱人”之亲亲推而广之，做到“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那就达到

天下大治的境界了。“仁”的意义是如此之重大，但另一方面却又是每一个人只要经过自己努力都可以做到的，“我欲仁，仁斯至矣”（《论语·述而》）。在孔子看来，“仁”本是每个个体的人都具有的人的内在欲求，如果把这种情感、欲念要求自觉地与一定的社会客观规定（礼）相融合，那么礼治的太平天下就会出现。

从孔子的仁学中不难发现，孔子把个体人格的积极发展和完成看作是真正实现社会和谐发展极为重要的条件。他宣称“匹夫不可夺志”（《论语·子罕》），“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表达了孔子对个体人格的主动性和独立性的充分肯定。这样，孔子就把古代受宗教神学信仰所支配的人，明确地变为由个体内在的心理——伦理要求所自觉支配着的人，变为在社会实践中去积极寻求自身欲望的合理满足的人。孔子对于人的观念的深刻变化，也就必然使孔子对审美和艺术这种社会现象提出深刻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见解，因为审美和艺术这种社会现象，归根到底是源于“自然向社会人生”这一漫长历史过程中的结果和产物，美学上一系列理论问题，总是与美学家、理论家对人的本质认识密切相关。在人神不分，人鬼相混的混沌时代，也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美学。孔子美学的重大价值正在于它第一次充分自觉地从人的内在情感要求出发，而不是从宗教神学的外在信仰出发去考察审美和艺术。在处于春秋末期这样一个去古未远的时代，在促使人的情感从宗教神学束缚下解脱出来，将人的感情导向以氏族血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之中，使这种感情抒发、消融、满足在伦理感受之中，这正是孔子美学的最大特色。

孔子的“仁学”主张通过人心的感化作用，使人们自觉地按照“周礼”的道德规范去立身行事，他反对依靠外部的强制手段去实行“仁政”。在孔子看来，通过艺术的审美过程是感化人心的重要途径，这种美学主张，集中表现在他所提供的“成于乐”、“游

于艺”的思想中。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孔子极为重视“乐”的教化作用，把“乐”与“礼”并提在一起。他认为要做一个完满的成人君子，必须学礼，同时必须学乐，因为乐能改变人的性情，能陶冶人们的心灵，从而使人们自觉自愿地去接受和实行仁道，孔子高度肯定了乐对于人性的审美教化作用的重要意义。

孔子的“成于乐”审美观，强调乐的审美作用在于对人的伦理心理上的交融统一，所以他把学礼学乐相提并论。而在《述而》中，他提出的“游于艺”，又从另一角度表述了他的美学观点的又一内容。他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在孔子看来，要做一个完满的贤人，首先要把学道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其次要把德作为自己立身行事的根据，再次要归于仁，最后要游憩观赏于各种艺事。孔子认为，通过对“艺”的学习、练习、掌握，能够陶冶人的性情，同时使人获得一种自由感。“游于艺”的“游”，包含着游憩、观赏、娱乐之意，也含有对技艺熟练掌握所获得的一种自由感受，是一种悠哉悠哉、愉悦舒和的审美感受。不能不看到孔子“游于艺”的论述中，已经意识到审美教育中美感对陶冶人的人格修养的作用。孔子把符合“礼”的社会规定变为人们出自天性的情感自觉需求相融合的道德规范，最终成为一种自由的“游戏”（“成于乐，游于艺”）以完成人的全面发展。把本来是原始文化中用来维系氏族社会的原始歌舞（乐）转化为发展完满的自觉人性相联系，这正是孔子美学观的深刻之处。

孔子之前，关于艺术的审美性、认识与教育功能作用的看法，还没有一个较为系统的认识，孔子则总结了前人有关论述，概括为一个系统的、全面而深入的艺术功能观：“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在春秋战国时代，诗、歌舞、曲等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所以孔子论诗的功能，实际上是可以包含其他艺术在内的。由此观之，孔子的上述论断，可以说，总结了从远古到孔子时代漫长时期中，人们对艺术认识的美学内容。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诗（艺术）的特殊社会功能，他重视艺术的情感特征，认识到艺术通过影响人们的思想感情来发挥它的社会作用，孔子要求诗（艺术）通过情感要素去感染陶冶个体的人，使个体自觉的心理欲求与理性的社会伦理规范融合起来，从而达到个体与社会的和谐一致。所以在许多美学理论研究者看来，孔子的美学既揭示了审美对陶冶个体的心理功能又注意到审美对谐和人群的社会效果的特色，这样的结论符合孔子的美学思想的总体构架。

先秦时代，作为中国古代美学理论发展初期阶段，在人们的意识里，美、善还不可能有严格的科学界定，从《论语》中，可看到孔子已经意识到作为美学范畴的“美”与道德范畴的“善”虽有联系，但有区别。孔子对美、善的看法，比较集中表现在对《韶乐》与《武乐》的评论中：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佾》）

孔子为何对《韶》乐大加赞赏，甚至达到“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的神魂颠倒的境况？就因为《韶》乐以最优美的形式表达了尧、舜以圣德受禅，不靠暴力夺取政权的内容，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满统一，所以《韶》乐是“尽美”又“尽善”，达到了美、善的高度统一。而《武》乐，虽然形式也十分完善，但它表现武王以征伐取天下的内容，讴歌杀伐征讨之事，违背孔子“礼治天下”的政治伦理标准。所以，它的内容不够完善，“未尽善也。”从孔子对具体艺术品的评论中，表现出他对美、善关系的完整看法。孔子认为未“尽善”的东西，也可以是“尽美”的，

这说明孔子已经看到了美的独特特征，美区别于善。从善的观点看来不完满的东西，从美的观点来看却可以是完满的，由此观之，美具有独立存在的地位和价值。这区别于善的美是什么呢？这从孔子对音乐的欣赏中可以看出。《八佾》记载孔子与人谈欣赏器乐美的体会说：“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孔子对器乐美欣赏的形象描述，纯粹是从审美上对音乐的把握，并没有涉及具体内容，这表明孔子看到了作为美的特征，它能给人以审美的感性愉快和享受，如声音的宏亮、盛大、和谐、节奏鲜明等等。孔子充分地肯定了这种美，只要它在根本上不同善相矛盾，即使尚未“尽善”，也不会失去它的意义和价值。孔子追求的美学理想就是“尽美矣，又尽善也。”在孔子看来，美并不是善的附庸，没有独立的地位，也不是“尽善”就等于“尽美”，或只要“尽善”，“美”达不到“尽”的理想境界也无关紧要。相反，要尽可能地把美、善提高到理想程度。这种对美善关系的理解是十分深刻的。

孔子论“文”与“质”的言论较多，其中比较集中地表达出孔子美学观的是《雍也》篇中一段：“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的原意是从道德修养角度确定“君子”的人格要求，在孔子看来，要成为一个仁人君子，必须达到“文”“质”兼备那样“彬彬然”的气质状貌才行。这里显然包含着孔子的审美理想要求。孔子所指的“文”明显地包含有感性形式的美的意义在内，其中也包含具有美学特质在内的各种文化修养等因素。“质”，孔子说得很明白，他说：“君子以义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立”（《论语·卫灵公》），又说：“夫达者，质直而好义”（《论语·颜渊》）。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的“质”指的是人内在固有的伦理品质。因此，孔子认为“质胜文则野”，意思是说，光有仁义之道的“质”，缺乏礼乐修养的形式美的教养，这样的人显得粗